

鲁迅出版系年





鲁迅出版系年

(1906—1936)

秦 川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哈尔滨

67/01/15



2 039 7045 3

封面题签：赵朴初
责任编辑：任 慷
封面设计：王祖珍

鲁迅出版系年

luxun chuban xinián

秦 川 编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7 6/16·字数 175,000

1984年 2 月第 1版 1984年 2 月第 1次印刷

印数 1— 3,200

统一书号：10093·594

定价：0.88 元

目 录

前言——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1)
例言·····	(30)
一九〇六年·····	(31)
一九〇七年·····	(32)
一九〇八年·····	(33)
一九〇九年·····	(33)
一九一〇年·····	(35)
一九一一年·····	(35)
一九一二年·····	(37)
一九一三年·····	(38)
一九一四年·····	(40)
一九一五年·····	(42)
一九一六年·····	(43)
一九一七年·····	(44)
一九一八年·····	(45)
一九一九年·····	(47)
一九二〇年·····	(50)
一九二一年·····	(50)
一九二二年·····	(52)
一九二三年·····	(54)
一九二四年·····	(58)
一九二五年·····	(61)

一九二六年.....	(67)
一九二七年.....	(77)
一九二八年.....	(87)
一九二九年.....	(95)
一九三〇年	(109)
一九三一年	(119)
一九三二年	(133)
一九三三年	(145)
一九三四年	(168)
一九三五年	(191)
一九三六年	(215)
后记	(230)

前 言

——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仅与他整个的光辉业绩紧密相连，而且成为他的全部生活甚至生命中不可少缺的支撑力量。在鲁迅对中国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和对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巨大贡献中，正包含着他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所作的伟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伟大的出版家，鲁迅在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至今仍享用不尽；还有指导的作用。他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屈不挠和韧性战斗的革命精神，和他那为革命哺育新花，忘我牺牲，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崇高品德，更是值得永远敬佩和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的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曾有过一些回忆录和单篇文章谈到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都较零散，不够系统和完整，且缺少应有的评价，以致作为伟大的编辑家和出版家的鲁迅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我尝试从下面三个部分作一概括的介绍。

为了评价鲁迅在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地位和伟大贡献，回顾一下他在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所走过的道路，出版方针及战斗特色是非常必要的。按照鲁迅思想发展的分期，即早期、

前期和后期等阶段，这里粗略地对他与出版工作加以阐述。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青年时期的鲁迅，在进化论世界观指导下开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活动的时候，就和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一九〇六年夏天，鲁迅在日本仙台放弃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认为救中国的道路“还应该有一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作为提倡新文艺的第一步，就是着手编辑和出版文艺刊物——《新生》。当时，鲁迅是要以它为阵地，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以起其国人之新生”，即启迪理智，廓清蒙昧，振兴中华民族，改造国民之精神。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追叙，也说明了他创办《新生》是出于那时发展着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是要在古老落后闭关自守的旧中国兴起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学运动的需要。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并未办成。原因是由于出世之前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然而，《新生》的编辑、出版方针和鲁迅办《新生》的革命精神，却一直贯彻到他整个一生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世界观的变化，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并发扬光大。

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日和七月二十七日，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编辑和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这是鲁迅在中国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留下的第一个实绩。这两册书共收翻译小说十六篇。计有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其中鲁迅翻译的有俄国安特莱夫的《漫》、《默》和迦尔洵的《四日》，还翻译了《铎台守》的诗部

分。鲁迅为小说集写了《序言》、《略例》和《杂拾》两则，并对全部译稿进行过修改，亲自誊清。这两册小说集中部分作品，就是《新生》的译稿。鲁迅在《序言》中阐明了翻译出版这两册小说集的经过、目的要求和具体的出版办法，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根本目的和革命方针。《序言》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然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涸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

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群益书社重印《域外小说集》时，以周作人的名义写的《域外小说集》序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些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几乎全无……”

“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 X 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

这一段话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搞翻译，搞编辑和出版，鲁迅都不是从个人名利出发，或以赚钱营利为目的的。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革命的编辑和出版方针阐述得很明确。他说：“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从革命的需要出发

去作翻译和编辑、出版工作，象一条红线贯彻始终。从现在出版的十卷集译文集，三百一十多万字的作品来看，几乎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和编辑、出版的。“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激发起人民大众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其他方面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

鲁迅一身参与或主编的报纸、刊物和丛书，据统计有三十多种，无一不与上述方针和革命精神相一致。比如辛亥革命时期，一九一二年在绍兴由越社主办的《越铎》日报，鲁迅就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名誉总编辑。《越铎》日报的发刊辞就是鲁迅的手笔。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为报纸阐明的主张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这一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与办报方针，不仅同早年创办《新生》的精神基本一致，而且有所发展。

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了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部的工作，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和中坚分子。他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站在一起，坚决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把《新青年》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革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堡垒。他无条件地遵从“革命先驱者的将令”，写小说，发议论，主动予以配合。自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五号起，至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出版的第九卷四号止，在三年多的时间内，鲁迅发表了小说五篇，新诗六首，随感录二十二则，思想批判论文二篇，通信三则，翻译文学作品四篇，附记、正误等其它文字七则，共四十九篇。著名小说《狂人日记》就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把当月主编的《新青年》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鲁迅在这期专号上，一下子就发表了小说《药》，随感录《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五篇很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作品。

鲁迅与李大钊并肩战斗，反帝反封建，猛烈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 and 失败的教训；热情赞扬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影响深远。那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三十三篇随感录，即是鲁迅在战斗中创造的最主要的文学新形式——杂文。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九二二年七月，《新青年》停刊了，团体也随之解散。正如鲁迅后来回顾的那样，五四时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有短暂的彷徨，但却未停止过对中国革命的探求，未停止过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继续同军阀官僚统治及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战斗。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号召，他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起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在《华盖集·题记》中，鲁迅也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即思想批评，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鲁迅思想的发展，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鲁迅发起组织了“语丝社”，编辑出版《语丝》周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又同韦素园等组成“莽原社”，编辑出版《莽原》周刊（后又改出半月刊），均由鲁迅主编。稍后，在一九二五年八、九月间，鲁迅还与一批有志于外国文学翻译的青

年组成“未名社”，出版《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必须着重指出，《语丝》和《莽原》在当时是两个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进步文艺刊物。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它们在同封建军阀统治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理人——“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等的斗争时，起到了重要阵地的作用。鲁迅在那时的许多重要作品和著名杂文，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

仅以鲁迅在北京时期为例，从一九二四年的十一月十七日《语丝》创刊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作品就有六十余篇，几乎占他在《语丝》（一九三〇年三月第五卷第五十二期终刊）上发表作品总数一百四十余篇的一半。这对刊物的政治倾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鲁迅主编的《莽原》，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起，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他离开北京去厦门，把刊物交与韦素园接编止，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中就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我的籍和系》、《答KS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著名杂文，有很强的战斗性，集中代表了《莽原》的战斗特色。

在鲁迅看来，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杂文。正如鲁迅自己所阐述的那样，杂文“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短小、精悍，十分灵活；在斗争中有如匕首，投枪，易制强敌于死命。所以，鲁迅大力提倡，自己也大力写作。之所以如此，并在其主编的刊物上显示这样的倾向和特色，完全是当时客观的阶级斗争，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这与鲁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和韧性战斗的主张分不开。

鲁迅在北京时期，还主编过《国民新报副刊》乙种，即该报的文艺副刊，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起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前

停刊止，鲁迅曾在上面发表过配合现时革命斗争的杂文，如《这个与那个》、《“公理”的把戏》等，同这一时期在《语丝》和《莽原》上所发表的杂文一样，发挥了强烈的战斗作用。

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最后十年中，鲁迅的世界观由进化论发展为阶级论，由革命民主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这一时期在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上，劳绩最大，贡献最大，思想最光辉，为革命和为大众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斗争更加频繁、激烈；主编的刊物和丛书更多，甚至自办出版社，自费印书也更多；此外，还大力提倡版画艺术，编辑出版各种外国的和我国传统的画册及木刻版画等等。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区的十年内战，亦即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发动了文化“围剿”。鲁迅也就在同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革命的伟人。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鲁迅初到上海编辑《语丝》的情形。在鲁迅手里，当时的《语丝》名符其实成了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其帮凶文人展开激烈斗争的坚强阵地，我们知道，从《语丝》四卷一期起，鲁迅在刊物上就连续发表了《小杂感》、《头》、《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著名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鲁迅还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危险，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出刊的《语丝》四卷三十二期上，刊出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通过剧中革命神的口，愤怒地谴责了蒋介石国民党，贩卖革命，屠杀人民的反动本质。剧中这样写道：“啊！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你吃人的事实。……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努力北

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革命，阴则昼夜在想方法，将要怎样地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剥夺国力……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这段台词可以看作是一篇讨蒋的檄文。发表这样的剧本，鲁迅就鲜明地亮出了刊物反蒋革命的政治立场，这在当时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气魄啊！

此后，《语丝》还发表过两篇揭露国民党在复旦大学搞特务统治黑幕的《通讯》。用“通讯”这种方式同国民党统治作斗争，也是鲁迅主编《语丝》时的一种创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语丝》四卷中，此类通讯不少，有的鲁迅还加按语发表，以增强其战斗力。

正因为《语丝》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在鲁迅主编《语丝》的一年内，“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还以所谓“言论乖谬”、“心存反动”的罪名加以取缔。鲁迅也因此被宣布为“堕落文人”而被呈请予以通缉了。

与此同时，在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内部发生了一场论争，鲁迅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仍以《语丝》作为主要阵地，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正确的思想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文章。也因此，鲁迅还被参加争论的另一方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称为“语丝派”的“主将”。如《文学与出汗》、《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等著名文艺论文，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在论争中起过良好的作用。这时，鲁迅从斗争的需要出发，还翻译介绍了一些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并同郁达夫合编《奔流》。在《奔流》由鲁迅主编时期，他为《奔流》写了十二则《编校后记》。除《奔流》一卷九期外，每期都有他的译著（《奔流》共出十五期）。自一九二八年以来，鲁迅与冯雪峰等合作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些著作和翻译文章的出版，不仅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文艺理论体系，

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还直接为后来的“左联”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我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左联”成立后，鲁迅一方面参加联盟负责主编文艺刊物，如《萌芽》、《文艺研究》、《十字街头》、《前哨》等。另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鲁迅更自觉地、英勇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文人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在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为革命、为大众的思想更突出了。这一点在鲁迅提倡新兴木刻运动，编辑出版木刻画集中表现得非常充分。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中说得很明白：“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所以木刻……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在《〈新俄画选〉小引》中，鲁迅早就说过：“因为革命需要，有宣传，教化，装饰和普及，所以在这时代，版画——木刻，石刻，插画，装画，蚀铜版——就非常发达了。”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廿九日致赖少麒的信中，也曾说到他自己在晚年拚命为革命、为大众而写作，而工作的心情。他说：“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这里所说的“零碎事”其中许多就是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鲁迅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一直未停止过对这方面工作的“时常做”。例如大家所熟知的，与友人合编、自费出版瞿秋白同志的《海上述林》，就是在经常严重的病痛折磨下坚持去做，直到逝世还关心着它的出版。

通过以上的各个时期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不仅可以看出鲁迅的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的道路、历程，可以看出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方针及刊物、丛书的战斗特色，同时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一斑了。

二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贡献是伟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下面从六个方面概略地加以叙述。

第一，在翻译方面，鲁迅是很早就从事个人翻译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的，而且是成绩卓著的伟大编辑家和出版家。如前所述，《域外小说集》的编辑和出版就很有开创性。尽管第一本只印了一千册，第二本只印了五百册，在东京和上海的销售情形也很不好，折了本，被迫停止了第三第四册的编辑出版工作，但鲁迅立志翻译和出版外国文学，特别是翻译出版“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道路，却执着地坚持着，至终不改。作为翻译出版的阵地，鲁迅先后发起和组织过的文学社团有“未名社”、“朝花社”，创办的刊物有《未名丛刊》、《莽原》、《奔流》、《萌芽》、《文艺研究》、《译文》等；主编的丛书有《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文艺连丛》、《朝花小集》及《北欧文艺丛书》（未出）等，大量介绍了外国进步文学、艺术作品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鲁迅只重视翻译、偏废创作的结论。鲁迅曾说，

他自己注重翻译并非要偏废创作，倒是“应该一同提倡”，“以作借鉴，其实也就是推进和鼓励创作”，“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促进新文学运动，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我们知道，鲁迅当年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开展翻译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的。以“未名社”的成立和《未名丛刊》的出版为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时的情况是“出版者和读者不喜欢翻译书”，“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北京书局不愿接受出版发行，鲁迅他们只是“另筹一笔印费”，自己翻译，自己编辑，自己出版。并不比编辑出版《域外小说集》时好多少。虽然条件很差，资金短缺，又时时受着政治的压力，但是，《未名丛刊》在介绍外国文学，尤其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方面，贡献是较大的。《未名丛刊》中，鲁迅自己翻译的有《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韦素园翻译的有《外套》、《黄花集》，李霁野翻译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不幸的一群》，曹靖华翻译的有《第四十一》、《烟袋》，任国桢翻译的有《苏俄文艺论战》，胡敦翻译的有《十二个》，董秋芳翻译的有《争自由的波浪》等。别人译稿中有好几种经鲁迅校订过，并由鲁迅写《小引》、《后记》加以推荐和评介。“未名社”从一九二五年夏天筹办开始，到一九三一年十月解散，存在了好几年，鲁迅说它虽“也并不长久”，“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评价甚高。

在中国出版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立出版社，自费印行反映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红军与白军斗争的著名长篇小说《毁灭》（法捷耶夫著）和《铁流》（绥拉菲摩维支著）。前者由鲁迅翻译，后者由曹靖华翻译。这两部译作连同其它八种，原来均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中，由上海神州国光社负责出版。但因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白色恐

怖，“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书店老板惧怕获罪而毁约。使得这两部名著不能由书店公开去出版发行，而只能由鲁迅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来自费印行。在这种情形下，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印数虽不可能多，但影响仍然不小。后来，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和重庆，这两部译著得到了再版，并大量发行，影响非常广泛了。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刊的《十字街头》第一期上，瞿秋白曾用“J.K.”的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鲁迅翻译出版《毁灭》给予崇高的评价。公开信说：“当然是中国文艺活动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鲁迅自己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一文中也说：这本书“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火炬”。而且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就更加明确地说到翻译介绍这部巨著到中国来，目的就是为了革命，为了“战斗”。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毁灭》给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说：“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需要出发，鲁迅尤其注意系统地介绍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在鲁迅主持下，由冯雪峰等人合作，编辑了一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也称《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计划组织翻译和出版十四种著作，交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出版。后因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禁止，仅出版八种。其中由鲁迅翻译的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批评》，苏联共产党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文艺政策》等。正是这些翻译出版的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武装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头脑。就连鲁迅自己，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